

富民与养民：唐甄的社会保障思想

王卫平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唐甄是清代初期著名的思想家,一生著述以《潜书》最为著名。其中特别强调统治者应关注民生,所论重民、爱民、富民、养民之思想举措,均是传统社会保障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从《潜书》看,唐甄的富民养民之政和社会保障思想是一个有机的体系,其内涵涉及改良政治、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等各个方面。

关键词:唐甄;富民;养民;社会保障

作者简介:王卫平(1962—),男,江苏溧阳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社会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江南地区慈善事业系谱研究”(项目编号:10BZS024)的阶段
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D092;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5)02-0178-04 **收稿日期:**2014-09-17

唐甄(1630—1704),原名大陶,字铸万,后更名曰“甄”,别号圃亭,四川达州(今达县)人。唐甄出身于宦宦家庭,因其父明末时曾任吴江知县,故入清后寓居吴江。顺治十四年(1657)返四川,于阆中考中举人。康熙十年(1671),出任山西潞安府长子县知县,治理长子有善政,“导民蚕桑,以身率之,日省于乡,三旬而树桑八十万本,民业利焉”^{〔1〕}卷70《文苑传一》。时都御使达良辅称其为“山西循良之冠”,但仅做了十个月的知县,就因故罢归,侨居苏州,转而治学,发愤攻读,思以学术救世。其间,唐甄生活极端贫困,“僦居吴市,仅三数椽,萧然四壁。炊烟尝绝,日采废圃中枸杞叶为饭。衣服典尽,败絮蓝缕”^{〔2〕}附录。迫于生计,唐甄先后经商、充当经纪人,均遭失败,只好以讲学卖文为生。康熙四十三年(1704)病歿苏州,年七十五岁。卒之次年,“翰林何纪瞻闻之,知先生贫不克葬,启请于八亲王。王赐白金五十两,命葬之”^{〔2〕}附录。

唐甄一生著述颇多,而以《潜书》最为著名。《潜书》是唐甄一生中“积三十年而成”的最重要的一部著作,集中反映了其政治和学术思想。《潜书》初名《衡书》,志在权衡天下,后以连蹇不遇,更名《潜书》,意为潜而待用。全书分上下两篇,每篇又各分上下,共九十七篇。上观天道,下察人事,远正古迹,近度今宜。誉之者谓其“直披胸怀,不假绳削,而气充词达,高下咸宜。论学术则尊孟宗王,贵心得,贱口耳,痛排俗学之陋;论治道则崇俭尚朴,损势抑威,省大吏,汰冗官,欲君民相亲如一家,乃可为治;皆人所不及见、不敢言者,先生独灼见而昌言之”^{〔2〕}《潘耒序》。毁之者则称其“大率愤时疾俗……而文无根抵,伤于剽锐,亦间为涩体,而弥不工。其论亦或迂谬不可行……此足笑倒千人矣”^{〔3〕}135-136。可谓见仁见智。

目前,学术界关于唐甄的研究已然非常丰富,但多集中于唐甄的启蒙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民本思想等的探讨,尚未有学者从社会保障

的角度对唐甄的思想展开研究。事实上，围绕富民养民之政和社会保障问题，唐甄也提出了不少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思想主张。

社会保障关涉社会各个阶层的生存问题，在传统时代更多的是表现为保障普通百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生存。因此，社会保障的核心是民生问题，举凡重民、爱民、富民、养民之思想举措，均是传统社会保障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从《潜书》看，唐甄的富民养民之政和社会保障思想是一个有机的体系，其内涵涉及改良政治、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等各个方面。

第一，倡导社会平等，缩小贫富差距。

在《大命》篇中，唐甄谈到：王公之家，一宴之费耗去农家一岁之获，“犹食之而不甘”，而苏州一带的百姓，“非凶岁为麦粥，杂以芥秆之灰，无食者见之，以为是天下之美味也”，社会上的不平等可见一斑。唐甄自己也是穷困潦倒一生，曾经日食“七糠三粃”，其“父死三十一年而不能葬，母死五年而不能葬，姊死三十年而不能葬，弟死二十九年而不能葬”^{〔2〕上篇下《大命》}，无法尽孝悌之道。社会贫富悬殊成了当时社会的一大痼疾，社会保障问题日益凸显。

在唐甄看来，“天地之道故平，平则万物各得其所”，不平势必影响天下的安定，就好比提衡“权重于物则坠”，挑担“前重于后则倾”，这都是因为不平所至。所以，统治阶层要思考如何缩小与民众的差距，不自异于民众。唐甄认为，社会的不平等和四海民众的困穷根源在于自秦以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因此，他极力主张抑制君主的至尊权势，倡导人人平等。他指出“天子之尊，非天地、大神也，皆人也”，君主与臣民并无贵贱之分，理应与民众过同样的生活，“存心如赤子，处身如农夫，殿陛如田舍，衣食如贫士”^{〔2〕下篇上《尚治》}，“贵为天子，亦可以庶人之夫妇处之”^{〔2〕下篇下《去奴》}。人君应当以上古贤君为榜样，以平民意识来对待自己的权位，使“君民相亲如一家”。因为人君的特殊地位，其行为作风势必对群臣和富户产生影响，若再施以缩小贫富差距的养民善政，带领群臣劝课农桑，发展工商，那么四海困穷的社会现实将得到改观，国家大治将成为可能。

第二，治者必先养民，养民离不开善政。

只有民有所养，天下才有“治”的希望，所以治者必先富民、养民，“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2〕下篇上《存言》}。唐甄主

张，明君、贤辅、良司应该实行“养民之善政”；“责饱者必炊饭，责暖者必缝衣，责治者必养民”。养民善政共有十八，“上善政六，中善政六，下善政六”^{〔2〕下篇上《达政》}。

上善政六种，包括：勤农丰谷，土田不荒芜；桑肥棉茂，麻苧勃郁；山林多材，池沼多鱼，园多果蔬，栏多羊豕；廩蓄不私敛，发济不失时；水旱蝗虫不为灾；犯其父母必诛，兄弟相残必诛；阐幽发潜，彰孝举节。

中善政六种，包括：独骑省从，时行乡里，入其茅屋，抚其妇子，民不以为官，无隐不知；强不陵弱，富能周贫；除强暴奸伪，不为民害；居货不欺，商贾如归；省刑轻杖，民自畏服；察奸发隐，四境无盗。

下善政六种，包括：学校殿庑常新，春秋享祀必敬；城隍、道路、桥梁、庐舍修治；纳赋有方，致期不烦；选勇力智谋，具戈甲干楯，教之骑射，以卫四境；天灾流行，疫病时作，使医疗治；蔬食布衣，燕宾必俭。

在唐甄看来，鼓励百姓勤于农事，多事种植，栏有羊豕、园有果蔬、池有鱼虾，仓廩有蓄，虽有凶荒不致冻饿；同时要求百姓尊敬父母、兄弟和睦，彰显节义，铸成良俗。前者是发展经济的对策，后者是推行良好的社会风俗，两手齐抓，方能称为“上善政”。地方官员微服私访，察知民情，整顿社会秩序，营造安定环境，居民友好相处，商贾公平交易，属于“中善政”。按时完纳国课，热心公益事业，卫护生命财产，医治疫病，则是“下善政”。很显然，唐甄所提的“善政”均是有感而发，是有针对性的。

要贯彻这十八种善政，必须仰赖素质良好的地方官。唐甄批评政令难以推行，国家难治的原因不在于民而在于官，“人皆以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他指出有些为官者，只知做官，“心不在民，虽田园荒芜，庐舍倾倒，而不一顾也；虽父兄冻死，子弟死亡，而莫之恤也”，这样的忘民之官，“虽无不肖攘民之事，而视民若忘，等于茅草”。因为“攘民者不多人，忘民者遍天下”，忘民较之于攘民危害更大，是“疾不救者日深，至于四海困穷，民无以为生”的一个重要原因。^{〔2〕下篇上《梃政》}为此，唐甄认为要加强对官员的管理，而治官离不开考绩，考绩要以养民、富民为功，“古之贤君，举贤以图治，论功以举贤；养民以论功，足食以养民。虽官有百职，职有百务，

要归于养民^{①②下篇上《考功》}。不能养民、富民的官吏,即使是廉、才之吏,同样无异于贪官酷吏。所以他说:“为其廉乎?廉而不能养民,其去贪吏几何?为其才乎?才而不能养民,其去酷吏几何?爱赤子者,必为之择乳母。勤谨不懈,得主母之欢心,可谓良乳母矣;然而无乳以饿其子,是可谓之良乳母乎?廉才之吏,不能救民之饥饿,犹乳母而无乳者也,是可谓之良吏乎?廉者必使民俭以丰财,才者必使民勤以厚利。举廉举才,必以丰财厚利为征。”^{①②下篇上《考功》}

在他看来,“为治者不以富民为功,而欲幸致太平,是适燕而马首南指者也”。因此,他提出要重用那些以富民为务的官员,使“天下之官皆养民之官,天下之事皆养民之事”^{①②下篇上《考功》}。唐甄预言,如果君臣一心,都能竭尽心思关心百姓的疾苦,将养民富民作为为官的头等大事,那么“三年必效,五年必治,十年必富,风俗必厚,狱讼必空,灾祲必消,麟凤必至”^{①②下篇上《考功》}。

第三,富民之道,在于重视农商、发展蚕桑。

民以食为天,求食以养身活命是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唯足食才可讲求礼义,正如管子所言“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食从何来?唐甄认为“自天子至于县丞史,皆食于农”^{①②下篇上《制禄》},“食粟衣帛,必念所自,况今薄禄之时,官之衣食,非取于农而实资于农乎”^{①②下篇上《棍政》}。“农民者,王后之本”,所以统治者应当重视农民,鼓励农业生产。

唐甄强调发展农业,并不只指粮食生产,还包括经济作物种植。在《教蚕》篇中,唐甄高度评价了桑蚕之利。依唐甄之见,吴地重赋困穷,但“民未至于空虚,室庐舟楫之繁庶,胜于他所”,主要得益于蚕之厚利。养蚕的可贵之处在于无论男女老少都能参与,对地力也没什么特殊要求,而且周期短,“以三旬之劳,无农四时之久,而半其利”,是致富之佳径。

唐甄曾出任长子知县,察邻县璩里民丰物阜,而长子县却是百姓困穷,“终岁而赋不尽入”,察其因由,发现璩里之民善养蚕植桑,于是唐甄决定在长子推行桑蚕之政。以往地方官也提出过桑蚕富民,但皆因方法不当而作罢。唐甄一改以往贴告示、发榜谕的传统做法,亲自深入民间,督导劝民,颇见成效,“先生之治长子也,首先蚕务,导民树桑,以身率之,日省于乡,三旬而树桑八十万本,民业利焉”^{①②附录}。

为使海内都能享桑蚕之利,唐甄建议天下的守令都能像自己一样深入民间督导和视察,“于务蚕之乡择人为师,教民饲、缫之法”,“省骑时行,履其地,察其桑之盛衰;入其室,视其蚕之美恶,而终较其丝之多寡”。并严格赏罚制度,“多者奖之,寡者戒之,废者惩之”,如此则“不出十年,海内皆桑矣”^{①②下篇下《教蚕》}。唐甄预言,如果“主臣一心,夜思早谋,无谋不行,无行不达”,那么“三月必达,终岁必效,三年必成,五年必治,十年必富”^{①②下篇上《权实》}。

唐甄重农但不轻商,他反对“重农抑商”的传统观点,主张“农商并重”,希望“农贾乐业,衣食滋殖”,认为“为政之道,必先田市……农不安田,贾不安市,其国必贫……农安于田,贾安于市,财用足,礼义兴,不轻犯法,是去残去盗之本也”^{①②上篇下《善施》}。并将“居货不欺,商贾如归”,列为十八善政之一,积极支持发展工商业。他指出“陇右牧羊,河北育豕,淮南饲鹭,湖滨缫丝,吴乡之民编蓑织席”等微末之业,如应其自然之利,任其发展,“日息岁转,不可胜算”。也就是说,如果任工商业自由发展,不扰民,那么“操一金之资,可致百金之利者也”^{①②下篇上《富民》}。农工商并重,百姓才能富足,生活才有保障。

第四,劝民为善,强调社会保障的政府责任。

政府若能实行富民养民之政,固能达致国裕民富,但任何社会总会有弱势群体存在,对于这些人群就需要国家和社会人士提供帮助。相较于社会上热心人士所从事的慈善救助,唐甄更倾向于政府的作为,也即是说政府应该承担社会保障的责任。唐甄举苏州育婴堂为例:“苏州有育婴之堂,以收弃子。凡穷民之不得有其子者,则送之堂中,愿育者怀之而去,衣禄医药,无不备焉。月给乳妇之食三百钱,乳妇之记籍者三百余人。岁费千余金,皆士大夫助之。此一乡之善事也。”^{①②下篇上《恤孤》}在唐甄看来,苏州育婴堂之育养弃婴,固然是值得称道的善事,但是不过是限于“一乡之善事”,于周贫济困“不过小补”。如果放眼天下,“生民之多,饥无食,寒无衣,父母不得养,兄弟妻子离散,婴儿之委于草莽者,不知其数矣”。面对这样一种情况,“天地不能容其生,鬼神不能救其死,心为之痛而手不能援”,我们又该怎么办呢?即使有仁义之人,“尽出府库之财,尽发太仓之粟,以大赍四海”,不过如育婴堂之救养弃婴,又能解救多少无以为生之人呢?所以,

唐甄认为,慈善机构所能解决的问题极为有限,不过是小善。那么,什么才是大善呢?如何做才能解决他所指出的问题呢?唐甄的回答是,政府要担当起救济百姓的重任。对此,他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吾尝观于田矣。天久不雨,诸苗将槁。吴中之人,农众而力勤,车汲之声,达于四境。然灌东亩而西亩涸,灌南亩而北亩涸,人力虽多,无如之何。迨夫阳极阴起,蒸为云雾,不崇朝而遍于天下,沛然下雨,濛濛不休。旦起视之,苗皆兴矣。沟塍蔓生之草,皆苗甲青青矣。人力之勤,不如普天之泽也。”^{〔1〕}下篇上《恤孤》通过“以人譬苗,以雨譬政”,唐甄指出:“若使四海之民,家给人足,衣食饱暖;父母之心,人皆有之,男子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男有室以养其父母,女有家以遗其父母;惟恐生男生女之不多也,亦奚待于育婴堂哉!百尔君子,何不以文王治岐之政,陈于今天子之前乎!”^{〔2〕}下篇上《恤孤》唐甄认为,救助弃婴——扩而大之为鰥寡孤独废疾贫病之人的根本,是“使四海之民,家给人足,衣食饱暖”。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唐甄认为根本在于实行富民养民之政。当然,唐甄并不反对民间的慈善事业,而是主张宣传善行,鼓励人们的行善之心。他说“扬人之善,德之大者也”,有善不扬,既遮蔽了行善者的善行,又阻碍了善人进一步行善的积极性。扬善的作用,在于让人们了解善心,促进善举,“善既广闻,与之者众,必有周其穷乏,救其急难者”。宣传善人事迹应有层次之分,“能扬一乡之善者,必使闻于一乡;能扬一方之善者,必使闻于一方;能扬天下之善者,必使闻于天下”^{〔2〕}上篇下《善施》。同时,他认为人们行善,也有缓急之别,以救助冻饿、丧葬、婚嫁三种情况而言,其缓急顺序“必先冻饿,葬次之,婚次之”;以受助者自身的情况而论,“必先鲁弱,强有力者次之,敏多谋者次之,忠献之

后次之”。因为对于身体素质好、头脑聪明灵活的人来说,谋生能力较强,活命机会较多,而愚鲁、体弱之人,“天薄其生,人憎其貌,吾不恤之,是助天人为虐也”。行善的对象有轻重缓急之分,但“善”之本身是没有轻重等差的。凡能泽被四海,救人急难,有功于人者,都是善,都值得推崇。如:能救一时之民,保数世之安,是功;能守一方、惠一邑,是功;即使是“不吝施者,饥,与之一饭;寒,推之一衣”,同样是功。唐甄一生虽然生活困窘,但在惠及助穷方面却是孜孜不倦,如其婿所言:“先生与人交,凡患难有无,必与共焉。李条侯困于京师,先生贷而与之二百余金。后自处贫窘,终未尝责其尝也。与曾青藜友善,青藜没,寡妾弱息,异乡无依,遍乞于友以给养之。”^{〔2〕}附录

在唐甄的社会保障思想体系中,有对民间疾苦的深刻洞彻和同情,有对社会不平等的激烈批判,也有具体的拯救实政措施,整个思想体系中处处闪烁着学术与事功相统一的思想光辉。其中民本思想是唐甄社会保障思想的理论基础。通过导民桑蚕,发展工商业实现“农工乐业,衣食滋殖”,以安民生,这是唐甄社会保障思想的重要内容。富民是根本,养民是补充,这是唐甄社会保障思想的核心。唐甄强调政府的社会保障责任,社会上虽有育婴堂这样的慈善机构,并在救济贫弱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四海困穷的社会现实唯有通过政府的富民养民善政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富民养民善政能否落到实处,人君和群臣责任重大。人君应以身作则,身先示范,带领、引导群臣重视民命、关心民生,施行善政,真正做好养民、富民工作;同时人君还应崇尚节俭,尽量缩小与百姓的生活差距,过平民式生活,在群臣和四海民众面前做出表率,导民从俭,从而促进全国性节俭风气的养成。

参考文献

- [1]清史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2]唐甄.潜书:附录[M].吴泽民,编校.北京:中华书局,2009.
- [3]李慈铭.荀学斋日记(五)[G]//李德龙,俞冰主编.历代日记从钞.第102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秋 语]